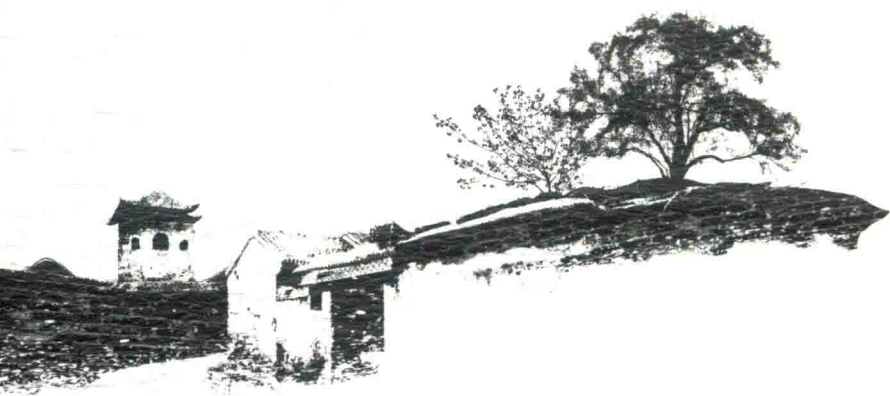


彭迎一 著

回望 一座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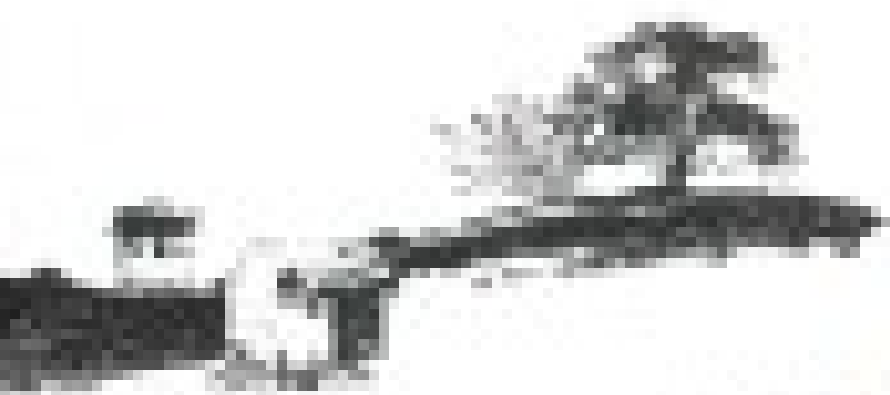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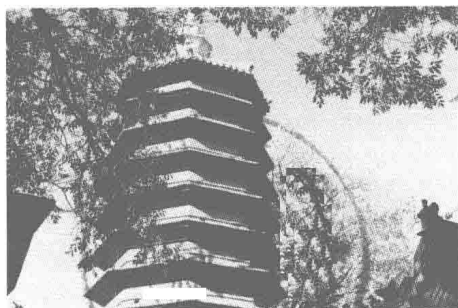


圖 說

一 座 古 城



回望
一座古城



彭迎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望一座古城 / 彭迎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063-9795-7

I. ①回… II. ①彭…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0896 号

回望一座古城

作 者: 彭 迎

责任编辑: 王 烨

装帧设计: 金 山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 × 210

字 数: 130 千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795-7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故垒斜阳	/ 001
故国有乔木	/ 033
大都遗响	/ 058
家住人间	/ 076
结庐在人境	/ 099
市井中的白塔	/ 126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 139
一个老北京	/ 160
当时只道是寻常	/ 185
后 记	/ 205

故垒斜阳

“最好是在一个十月的晴朗的早晨登上德胜门马道。向西你可以看到不规则的蜿蜒的城墙，城墙上灌木丛生，小树葱茏。墙下道旁，椿树高耸，绿荫笼罩。南行数步，便是西海的延伸部分——积水潭，潭边垂柳梳风，摇曳多姿。纵目远眺，越过一片宽阔的原野，在辽阔天边处是隐隐闪亮的西山。”“在这条路上，经常可以看到一队队骆驼经过，向安定门和德胜门的方向走去。这支驼队沿着柔软的沙地默默行进，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从领头骆驼身上发出的叮叮当当的驼铃声。”

读着这两段文字，眼前似有一轴古旧的画卷慢慢展开：焦墨皴染的城墙，淡墨晕出的水波，逆锋枯笔斜出的老树，减笔勾勒渐行渐远的驼队，留白处是高天苍远，厚土辽阔。这轴画意在笔先，虚虚实实，有一种逸气。这是自古以来这方水土养成的中国文人的神韵，中国文人的意趣。但是，写下这段文字的却是一个瑞典人，他的名字叫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15世纪末，随着新航路的发现，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们陆陆续续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瑞典地处北欧，得知东方有

这样一个古老神秘的国度要稍晚一些。当大西洋的海风把这个消息送到他们耳朵里，国力富强的瑞典人按捺不住了，无所不在的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瑞典的港口城市哥德堡扬帆起锚，驶向太阳升起的地方。1731年到1806年间，往返于哥德堡至广州的贸易航行有一百三十二次，三十七艘船轮番驶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横穿印度洋，抵达广州，运回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家具，更带回了数不清的新奇见闻。同时，到法国留学的瑞典人也从另一个渠道听说了在汪洋大海的另一边有一个农耕文明的理想国。到了19世纪初，瑞典的上帝的使者传教士们也出发了，他们的足迹近至两广，远至川陕、内蒙古。较为深入的了解使他们接触到了这个东方国度的文化内核，然后又把这些介绍回他们自己的祖国。当时闭关锁国的中国人无论如何想不到，在遥远的西北方有一群相貌语言习性迥异的人，以客厅里摆放着中国家具、品着微苦的中国茶、谈论中国话题为时尚，国王收藏着中国的青铜器、漆器，皇后生日的庆典上，王子身穿中国服装出现在宾客面前，王宫近旁甚至有仿得像模像样的中国园林，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一派中国士大夫情趣。

渐渐的，这个国家的精英人士渴望看到更多的风景，他们不再甘心浅尝辄止，不再耽于猎奇的享受，而是背起行囊，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中国，要一探究竟。

1895年，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了。他三次远征新疆西藏的戈壁沙漠，几乎搭进性命，测定了罗布泊的位置，发现了楼兰古城。1910年，语言学家高本汉来了。他从汉语特有的四声

里听出了美妙的韵律，从此着迷，一发不可收，研究出了以唐代长安方言为基础的中古汉语语音系统。1914年，考古学家约翰·古纳·安特生来了。他在河南组织发掘了仰韶文化遗址，在北京发掘了周口店猿人遗址，推进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探索 and 发现。之后就到了1920年，瑞典美术史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来了，站在了苍苍莽莽屹立了数百年的北京城墙下。

这个异邦人沿着城墙久久徘徊，高大厚重的墙把他反衬得身影渺小，好像一个古老的巨人俯视着一个满脸惊讶的孩童。他穿过几米纵深的城门，似乎走进了时光幽邃的怀抱，一阵恍惚，城门那边的天上仿佛挂着明朝的太阳。他攀上高高的墩台，趴在雉堞上极目远眺，金碧辉煌的宫殿、绿色琉璃瓦覆盖的宅邸、古木掩映的灰色的矮房子尽收眼底。他走着，有时在早晨，有时在正午，有时在傍晚。有时晴，有时阴，有时风，有时雨。他仔细观察城墙的变化，他的表情也跟着变换，欣赏，愉悦，惊叹，痛惜。他走着，停不下脚步，着了魔似的。

他看到了几十个窗孔整齐排列的箭楼，重檐凌空欲飞的城楼，月牙形的瓮城，城中的关帝庙；他看到了城墙上茂盛的酸枣树和这一带特有的大蓟，城外的羊群驼队，河里的鸭子；他看到了黄土道上骑着毛驴昏昏欲睡的旅人，沿着城根散步的遛鸟人，在护城河里光着屁股戏水的孩子。眼前的一切就是曾经让他心醉的中国画的真实版，现在，他可以触摸，可以听到，可以闻见这个画里的世界，他就置身其中，他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变得异常灵敏，生怕错过一片云的影子，一丝风的唿哨，一朵槐花坠地的声响。几十里城墙，他看了个遍。

喜仁龙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不愿只当一个看客，一个远远眺望袖手旁观的欣赏者，他要为这一抱城墙做点什么。

1921年初夏，城墙下的浓荫里响起第一声蝉鸣，一队人走来。喜仁龙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许可，带着八个中国学生开工了。他们用测绳、厚布尺、木板尺、手持水平仪勘测，他将城墙分成若干段，比如，南城墙他分了一百一十五段，测量各部位尺寸、砖的大小薄厚，查看修建年代，砖文，碑记，墙的现状，墙内外建筑，地形地貌。他为城墙留下了测绘图、勘查记录，拍摄了百余幅照片。然后，他查阅了明清典籍《顺天府志》《日下旧闻考》以及《马可·波罗行记》，了解这座古城的兴衰史。他发现中文里“城市”和“城墙”这两个概念都用“城”来表示，他认为这是因为在中国北方不存在不带城墙的城市，没有城墙就不能算一个传统意义的城市。他想起来北京的这一路上所见到的寺庙、草房、马厩处处都有墙垣，而北京的城墙则是登峰造极的典范。这个崇尚自然素朴的北欧人对城墙情有独钟：“纵观北京城内规模巨大的建筑，无一比得上内城城墙那样雄伟壮观”，他说，城墙粗看很单调，不如宫殿寺庙赏心悦目，但它分外古朴，绵延不绝，“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他尤其喜欢城门，他说城门就像一个人的嘴，呼吸发声，从不停歇。他在城门旁仔细观察：黎明，厚重的城门缓缓开启，吱吱嘎嘎一阵响，像一个刚刚被唤醒的巨人呻吟着。赶着马车的乡下人迫不及待地进了城。日上三竿，城门里人流涌动，车子、牲畜、行人络绎不绝，卖菜的挑着颤巍巍的担子，出殡的队伍打着白幡，娶亲的



明城牆下的百年老槐

车马披红挂绿。热闹过后，暮色降临。门前冷落车马稀，城门慢慢关上。人世间的希望、失望、生机、枯萎在城门洞狭窄的通道里纠缠在了一起，他在这里摸到了“全城的脉搏”。

不仅如此，“中国人设计任何一个建筑物——无论是一座房屋，一座寺庙，还是整个城市，绝不仅仅从美学和实用角度出发，他们总是有含义更为深刻的目的。”认识到这一点，让这个异邦人觉得既深奥又无奈。深奥的是北京城的规划竟以天上的星宿为依据，有各种复杂的象征意义，一座城门的位置、体量、命名都与礼制思想相关；无奈的是，这种玄虚“对于我们西方人似乎太含混、太暧昧了”，实在是搞不懂。

但这并不妨碍喜仁龙的兴致和决心，一切就绪，几个月来四处奔波的他终于安安静静地在桌边坐了下来。是时候了，他要把他看到的“砖砌的长幅画卷”变成文字。他拿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第一句话：“我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

二十多年后，一个中国青年踱进伦敦的一家旧书店，从满坑满谷的书堆中瞥见了一本书，它静静地躺在那里，并不十分起眼。可能是有缘吧，中国人顺手拿起它，一看书名，怔了，再一翻，就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歇山顶，琉璃瓦，脊兽仙人，拱门，墩台，箭窗……捧着书的手微微颤了一下，眼睛里露出异样的光彩。看看书价，可不便宜，但他毫不犹豫地掏出兜里的钱买下了它。这一夜，中国青年的房间里灯光一直亮着，直到天色熹微。他读完最后一页，把书轻轻合上。封面上的书名是：《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作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又过了三十多年，北京的城墙荡然无存，城楼侥幸留下三座。为了填补古城的空白，填补古城人缺损的记忆，当年那个通宵夜读的年轻读者、后来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拿出了珍藏多年的书，托人译成中文，亲自为它作序，在城墙的故乡出版，给这一段耐人寻味的缘分画上了句号。

侯仁之能在重重叠叠的书架中与喜仁龙邂逅，看似偶然，细推敲却也是命定的因果。他在序中追忆道，1931年的一个傍晚，二十岁的侯仁之遵父命从山东来到北京求学。火车像一个赶路赶得精疲力尽的汉子喘息着停在了前门火车站。“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在相继而来的岁月里，尽管风雨飘摇，甚至狂飙陡起，摧屋拔木，但是这粒微小的种子却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是它启发了我的历史兴趣，把我引进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科学探讨的殿堂。”侯仁之的感受极有代表性。那个年代，很多走出前门火车站的人第一眼看到正阳门，都有过心动的感觉。季羨林去国十年，学成归来，在1946年9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九点五十分到北平。我在黑暗中看到北平的城墙，不知为什么，忽然流下泪来。”于侯仁之而言，这是一扇非同寻常的门，进了门，他的人生别有洞天。

侯仁之考上了燕京大学，周一到周六，他在校园里上课；周日，他一个人在圆明园这座废园里“上课”。这座盛产古迹的城市正是那粒微小的种子的沃土，润物细无声的好雨浸润着

它。这期间，他在南城见到了金中都城墙的遗址。1946年，他负笈远行，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研习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寒窗苦读之余，星罗棋布的小书店就是最好的休息场所。那是个喜爱阅读的民族，即使在二战期间，纳粹的飞机把这座城市炸得面目全非，英国人都会在喘息时来到一半是废墟一半仍立着书架的书店里淡定地捧一本书看。就在小书店里，他遇到了喜仁龙。

有什么能比身在异国他乡却见到了故国景物更让人心潮起伏的事呢！虽然它们只是文字、图片，虽然它们是在纸上。侯仁之想起了走出火车站的那个晚上，乡愁如水，时光倒流。

出现在燕京这块土地上的最早的城垣已经找不到一丝踪迹。北魏人酈道元云游到此，看到城西北有个土丘，当地人叫它“蓟丘”，不知是不是黄帝后代的封地蓟城城垣的残迹。酈道元很看重这个土丘，郑重地把它写进了书里。春秋战国时，雄霸北方的燕国吞并了蓟国，将其作为都城。之后，雄霸中国的秦国又攻破了这座城，燕国销声匿迹。想来在世八百年的燕国的城墙不会是一张脆纸，也曾抵挡过秦国的虎狼之师。

秦以后这片土地时常改名换姓，到了唐朝人们把这座城池叫作“幽州”。幽州很开放，城里有专门的胡市，有大量的胡商，集市上卖胡服，深目高鼻的伶人跳胡舞。但是这座城的人很喜欢筑围墙，他们把整座城围在墙里，还把城分割成二十六个坊，坊四面也筑上墙，有坊门，昼启夜闭。如果穿越时空鸟瞰幽州，那就是一个用一道道墙画出的棋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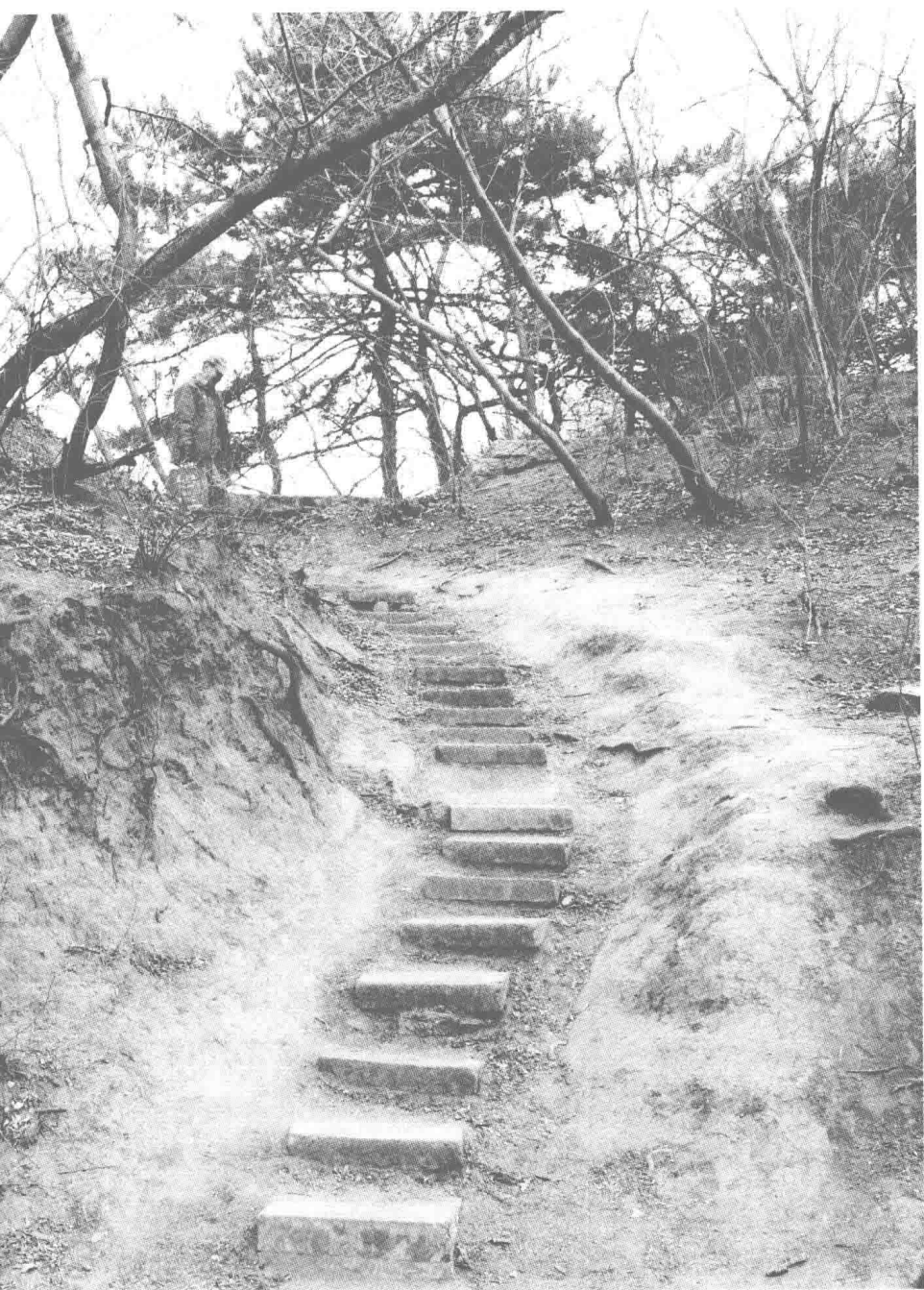
公元938年，一个叫契丹的游牧民族来到了这里。不过他们不是唱着牧歌来寻找草场的，而是策马挥鞭弯弓搭箭，用武力征服了这座城市。反过来，这座规整繁华四通八达的城市又征服了契丹人的心，他们立幽州为辽国的陪都，称“南京”。自此，这座城开始从一个区域重镇逐步转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之后的朝代无不对这座城表示青睐与器重，他们摧残过它，也成就了它。

契丹人很实际，不拘礼数，没有汉人征服之后就疑神疑鬼非要扫荡前朝王气的意识。幽州城那么合他们的心意，稍作更动便拿来用了，连坊名都懒得改。南京城方方正正，每面城墙各设两座城门，城内各门前都有一条路，贯通东西南北，形成一个“井”字。城中建起皇城，契丹宗室倾慕汉文化，他们的皇宫按照中原文化坐北朝南，皇城南门为正门。有意思的是，契丹人在理智上接受了汉族人的方位观念，但他们的身体却想不通，平时习惯地只走东门。因为在草原上，他们古老的帐篷的门世代朝着朝阳升起的方向，清晨一开门就会看到万里霞光，所以这个民族以东为正，逐日而居。

幽州变身为南京后，直接与北宋对峙，成了军事前沿，指挥中枢，平时驻军数万，打起仗来数十万兵马集结，其城墙十分结实，高三丈，宽一丈五，也算威武了。但金人嗤之以鼻，12世纪初，他们入主这座城市后，不像契丹人那么随遇而安，他们眼界很高，取法乎上，以汴京为榜样，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扩建。燕京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工地，建城需要大量黄土，土取自涿州，从燕京到涿州出现了一条蜿蜒长龙，人手一筐，往



元大都土城遗址



返传送。“役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累累白骨上的金中都的确比辽南京气派，更有都城的样子，只看城墙便可知。金人将城墙向外扩展，每面设城门三座，每个城门上都有城楼，每面中间的城门有三个门洞。如此张扬的城墙是为了向南宋、向世人、向天下宣告主人的不可一世，王者气概。

元代，弃旧城，在东北方，一座全新的城池诞生，城墙夯筑得更高更厚，新土绵软，夏天暴雨来袭，城墙时常坍塌，有人想出一个主意，给城墙披上“蓑衣”。一时间，文明门（今崇文门位置）外设立了苇场，征收芦苇百万担，编成苇衣，以护城墙。土城屡经风雨屡次夯筑，变得如同岩石一样坚硬。今天北京城北那一脉土岗成了男孩子们玩打仗的好去处，要知道七百年前它可是宽二十四米、高十六米的大都屏障。元大都的城门至今还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看到它们的影子，地铁公交的站牌上写着健德门、光熙门、安贞门，虽然有名无门，却也是一个王朝微弱的回音。齐化门，明朝时改名为朝阳门，不过我小时候很多老北京人都固执地叫它齐化门，“化”字读轻声，吐字发音皆不清晰，三个字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像是字们自己出溜出去的，如同一筷子没兜住的打卤面。想来老北京人并不是对元朝有多少留恋，而是“朝阳门”说起来有点硌嘴，不如“齐化门”对他们的脾气。

大都建好后，有个叫马可·波罗的西洋人来到了城门下，向前张望，惊愕得张大了嘴，他看到“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全城地面规划